

## 槃邁硕人徐奮鵬与《伯喈定本》

朱万曙

明笔峒山房刊刻的《槃邁硕人增改定本西廂記》，已经为古典戏曲研究者所熟知，1963年，中华书局影印了该本，著名学者王季思还为该本写了跋文，作了介绍和评论（见《玉轮轩曲论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）。但是，槃邁硕人增改的《琵琶記》却一直没有得到注意；关于该本的藏处，侯百朋先生的《〈琵琶記〉資料汇編》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）注明藏于日本东京大学，国内学者当然难以见到；黄仕忠《〈琵琶記〉研究》（广东高教出版社1996年出版）在“参考书目”中列出该本藏于国家图书馆，但书中对该本未作讨论。最近，笔者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阅读了这个本子，该本无封面，卷首无目录，首行题“词坛清玩 潘邁硕人增改定本”；全书无插图，分为上、下卷，眉栏多有眉批，第一、第二十九、第三十出后有批语。卷末还附有《新增陈妙常改妆》一出戏，惟出末批语已经残缺。本文即对该本略作介绍和考论。

### 一、关于槃邁硕人徐奮鵬

关于槃邁硕人其人，王季思先生为《西廂記定本》写的跋文里没有考证，只是从朱熹对《诗经》的解释中推测，“大约是一位不大得时的文人”；蒋星煜先生在《徐奮鵬校刊的评注本〈西廂

記》和演出本《西廂記》》(見《〈西廂記〉的文學研究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)一文中對槃邁硕人進行了考證，他從清代光緒《撫州府志·人物志》中發現，臨川人徐奮鵬號“筆峒先生”，並且與湯顯祖有交往；同時，他又從徐奮鵬的《筆峒生新悟》(萬曆四十一年刻本)中發現，各卷卷首均題“硕人邁中徐奮鵬自溟甫著”，由此，蔣星煜先生認為，槃邁硕人就是徐奮鵬。蔣先生的考證是正確的，筆者在國家圖書館還閱見了明金陵光啟堂王荆岑刻本《徐筆峒先生十二部文集》，可以補充一點材料，證明槃邁硕人就是徐奮鵬，徐奮鵬的確改定了《西廂記》和《琵琶記》。

《徐筆峒先生十二部文集》所收的文集為《理學明辨錄》、《击壤亭集》、《书中疑誤》、《硯滴海濤》、《千古尚論錄》、《壅天論》、《汇輯各文》、《雜著諸文》、《吟坛集古》、《雜吟诗词》、《邁中小語》、《迩言》。各集卷首均題“臨川筆峒生徐奮鵬自溟父著”，這與蔣星煜先生提到的《筆峒生新悟》的題署是大體一致的。第八卷《雜著諸文》中有《硕人對》一篇，以客問主答的形式解釋了自己號“槃邁硕人”的心迹：“有士問于筆峒子曰：君居邁中，而自號硕人。夫硕者大也，……筆峒子啞然失笑曰：而不聞乎《衛風》之詩云：考槃在阿，槃邁硕人之邁，夫阿而考槃也，考槃于阿而云槃邁硕人也，则所謂大者，大以迹乎，亦大以心乎”，不僅解釋了他號槃邁硕人是賢者隱逸之意，也完全証實了槃邁硕人就是徐奮鵬的別號。

值得注意的是卷七《汇輯各文》中還收錄了《西廂記序》和《琵琶記序》各一篇，為治戲曲史論者從未提及，現移錄如下：

### 《西廂記序》

天下惟情而已。然情為才者用也。倘不才而情，則俊迈婆娑，扮里庐阪登徒子，迥然笑之已。天下孰有才情兼極其至如崔張兩人者？兩人事見唐人《會真記》，至董、王、关三

氏編而為《西廂》傳奇，此无论其事之有無、真偽，而書生旅魂牽留洛浦峽雲之間，其詩意琴心逸致，遐悰不能自己。寒儒臥青毡上，大抵楚況多如此，彼委情弱思，不下章台、臨邛，矧遇君平、長卿能介然已耶！此兩人者，造物實富其情，而用之于才，才又足以爲情用也。董、王、關三氏，蓋善于選情而長于標才者也。獨惜奇人哲士，往往困守孤庐，永抱荀子難得之，恨而傳，于易安之姿至有以嫫母擬者，可勝叹哉！世有謂《西廂記》近鄭聲而當放者，此必其情不摯而才自局也。予謂傳奇如此兩人事，其才情當自不沒于天壤，予能无愛其情而高其才！

### 《琵琶記序》

《琵琶記》，說者以爲元高東嘉鄙薄王四易妻周氏而娶花不氏女，又以爲唐蔡節度易妻趙氏而娶牛僧孺女。第此亦不能辨其孰是。但即其傳中事評之，天下焉有子登仕籍而亲爲沟中瘠者乎？即曰兵戈阻隔風塵，詎不能曲致其力以爲顧養計者乎？事斷乎未必有也。如有之，則其爲子之罪能逃于天地之間耶？雖其臨庭泣訴，庶其陳情之表、歸墓遐悰，庶几攀柏之號亦何以贖耶哉！我高皇帝感是記而執王四，蓋謂灭亲亂伦，即事涉影响，犹在所必惩，况乎天下有实犯其罪，若而人者，將亦何說之辭？讀《琵琶記》而不泫然于明发之怀者，非夫也。昔晉王衷以父之不得其死，讀蓼莪而不勝其痛，門人因为之廢詩，窃謂今時有抱瓶罄之耻者，宁忍見蔡邕傳奇哉！

兩篇序文的見解雖不十分深刻，但仍然有可取之處。前者首先認爲“天下惟情而已”，這顯然是晚明主情思潮的觀點；同時，作者又認爲《西廂記》既寫情，也寫了才，崔、張二人才情相輔相成，才使得作品更具有美感；進一步看，董解元、王實甫、關

汉卿“善于选情而长于标才”，才写出这样优秀的作品来，因此，《西厢记》无论是所写的崔张才情还是作者的才情都足可令人推崇不已。后者驳斥了《琵琶记》所写为王四或唐代蔡节度事的说法，认为那种将作品所表现的内容牵扯到实人实事上的观点是不可取的，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具有悲剧的感染力，能够感动读者。在十二部文集中，只有这两篇关于戏曲作品的序文，而槃邁硕人恰恰增改了《西厢记》和《琵琶记》，它正说明了徐奮鹏的确是槃邁硕人，也是两部作品的增改者。

## 二、槃邁硕人对《琵琶记》的改动

徐奮鹏对《琵琶记》像对《西厢记》一样，也作出了很大的改动。他对作品的改动，可以分三个方面来审视：

一是改动结构。在通行的刊本中，《琵琶记》一般有四十二出，可是改本将它压缩成三十出，现将其出目与通行本对照如下：

### 通行本

1. 副末开场
2. 高堂称寿
3. 牛氏规奴
4. 蔡公逼试
5. 南浦嘱别
6. 丞相教女
7. 才俊登程
8. 文场选士
9. 临妆感叹
10. 杏园春宴
11. 蔡母嗟儿
12. 奉旨招婿
13. 官媒议婚

### 《伯喈定本》

1. 伯喈总题
2. 高堂祝寿
3. 清闺女诫
4. 严命逼试
5. 送行嘱别
- “
6. 登程赴选
7. 临妆感叹
8. 觅婿订婚
9. 遇荒乏食
10. 成名议姻

-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14. 激怒當朝  |           |
| 15. 金閨愁配  |           |
| 16. 丹陛陳情  | 11. 上表陳情  |
| 17. 义倉賑濟  |           |
| 18. 再報佳期  |           |
| 19. 強就鸾鳳  | 12. 強婚成配  |
| 20. 勉食姑嫜  |           |
| 21. 糟糠自咽  | 13. 祝發葬親  |
| 22. 琴訴荷池  | 14. 弄弦寄悲  |
| 23. 代嘗湯藥  |           |
| 24. 宦邸憂思  | 15. 思親覓寄  |
| 25. 祝發買葬  |           |
| 26. 拐兒貽誤  |           |
| 27. 感格坟成  | 16. 感天坟成  |
| 28. 中秋望月  | 17. 望月思家  |
| 29. 乞丐尋夫  | 18. 描容尋夫  |
| 30. 日間尋衷情 | 19. 日間情吐真 |
| 31. 几言諫父  | 20. 几諫求歸  |
| 32. 路途勞頓  | 21. 沿途苦栖  |
| 33. 听女迎亲  | 22. 悔過迎親  |
| 33. 寺中遺像  | 23. 入寺遺像  |
| 35. 兩賢相遘  | 24. 兩媛奇遘  |
| 36. 孝妇題真  | 25. 书館題詩  |
| 37. 书館悲逢  | 26. 館內悲逢  |
| 38. 張公遇使  | 27. 張公遇使  |
| 39. 散发归林  | 28. 散发归林  |
| 40. 李旺回話  |           |
| 41. 風木余恨  | 29. 風木余恨  |

42. 一门旌奖

30. 孝感天恩

从上表中可以看出，徐奋鹏对通行本《琵琶记》的压缩，主要是在前半部分，其中“丞相教女”、“文场选士”、“奉旨招婿”、“激怒当朝”、“李旺回话”五出全部删除；其他各出有的系合并两出或三出为一出，有的则为新增，如“遇荒乏食”出是合并“蔡母嗟儿”和“义仓赈济”两出而成的，“强婚成配”是合并“金闺愁配”、“再报佳期”、“强就鸾凤”三出而成的，中间有删减；而“觅婿定婚”一出则为徐奋鹏新增的笔墨。

从表中我们还不难发现，向来被认为是《琵琶记》精华的“糟糠自咽”和“代尝汤药”两出戏被徐奋鹏删掉了。对此，徐奋鹏在眉批中作了解释：“原本‘咽糠’、‘尝药’二出，非不见作者之情至，动观者之心伤。第世间举演梨园，多是华堂乐事，而双亲继歿，已为太惨，况又以咽糠亡乎！今俱存而不论，止于‘祝发’出内且白表出公婆继歿缘故，若观者必欲求备，则自有东嘉原本在，可寻而演也。”看来徐奋鹏删去这两出戏，并非是认为它们的艺术水平有问题，相反，他充分肯定了它们“见作者之情至，动观者之心伤”。他之所以将它们删除掉，一是从《琵琶记》的演出多为“华堂乐事”、一般观众更愿意观看喜乐的内容，而他要为演出提供一个“定本”的情况考虑的；二是觉得观者若要“求备”，还可以找到高明的“原本”演出，这样的删除并不损伤原作的精华部分。

二是改动情节。改动得最为突出的有两个地方：其一，是“沿途苦栖”一出，通行本中写得比较简单，徐奋鹏在该出增加了两个“里妇”听赵五娘弹唱〔琵琶词〕，尤其是〔琵琶词〕是完全新增的内容，引录如下：

试将曲调理宫商，弹劫琵琶心惨伤。不弹雪月风花事，且把历代源流诉一场。混沌初开盘古事，三才御世号三皇；天生五帝相继续，尧舜心传夏禹王。禹王后代昏君出，乾坤转

意屬商湯。商湯之後紂為虐，伐罪吊民周武王。周室東遷王迹熄，春秋戰國七雄強。七雄吞并為一國，秦室縱橫号始皇。西興漢室劉高祖，光武中興后獻皇。此時有個陳留郡，陳留有個蔡家莊；蔡家有個读书子，才高班馬飽文章；父親名喚蔡崇簡，母親秦氏老萱堂；生下孩兒蔡邕的，新娶妻房趙五娘。夫妻新婚才兩月，誰知一旦拆鴛鴦。幸逢朝廷開大比，張公同勸赴科場。苦被堂上親催遣，不由妻諫兩分張。指望錦衣歸故里，誰知一去不還鄉。自从與夫分別後，陳留三載遇飢荒，公婆受餒誰為主？妻子耽飢實可傷。可怜三日無餐飯，幸遇官司開義倉。家下無人孤又苦，妾身亲自請官糧。行到無人幽僻處，里正搶去甚慌張。奴忙回家無計策，將身赴井淚汪汪。遇得張公來答救，分糧與我食姑嫜。糧米兌作二亲膳，奴家暗地自挨糠。不想公婆來瞧見，双双氣倒在廚房。慌忙救得公蘇醒，不想婆婆命已亡。自叹奴家身運蹇，豈知公又夢黃粱。連喪雙亲手莫措，香云剪下賣街坊。又遇太公施仁義，刻府銘心怎敢忘。孤坟獨造誰為土，指頭鮮血染麻裳。孝感天神來助力，搬泥運土事非常。筑成坟墓神吩咐，改換衣裝往帝邦。畫得公婆儀容像，迢遙豈憚路途長。琵琶拔詞親覓食，敬往京都尋蔡郎。皋魚殺身以報父，吳起母死不奔喪；宋弘不棄糟糠妇，黃介<sup>飞</sup>婚薄幸郎。此回若得夫相見，未審兩下得成双？從頭訴盡千般苦，只恐猿聞也斷腸。

這段〔琵琶詞〕雖未見于通行本，但是在晚明戏曲選本《詞林一支》卷三所收的《趙五娘描畫真容》、《大明春》所收《五娘描容》以及《樂府紅珊瑚》卷十四所收《趙五娘描真容》中均有；另外，《玉谷新簧》卷五中層的“時興妙曲”中，收有沒有道白的〔琵琶詞〕，《摘錦奇音》卷一目錄里有《五娘琵琶詞調》，惟正文已經缺失。由此看來，〔琵琶詞〕不是徐奮鵬的創作筆墨，而是他對當時已經流行於民間舞台的《琵琶記》改本的吸收。

第二处大的情节改动是“风木余恨”一出。蔡伯喈携赵五娘和牛氏来到蔡公、蔡婆的坟前，被张广才责备了一通；赵五娘、牛氏提出要为公婆立碑，请张广才书写碑文，张写道“有孝有能赵贞女，不忠不孝蔡伯喈”，蔡伯喈求他不要这样写，张广才改写为“有孝有能赵贞女，全忠全孝蔡伯喈”。

三是改动曲词和道白。例如，第一出〔沁园春〕曲中有“书馆相逢最惨凄”一句曲词，“最惨凄”三字被改为“叙悲欢”，其眉批说：“李卓吾云：‘书馆相逢最惨凄’句大不通，此时不惨凄矣！改‘叙悲欢’妙。”这方面的改动非常多，这里不一一例举。

徐奋鹏对《琵琶记》的改动并不是随意的，而是有一定创作思想的。从批语中可以发现，徐奋鹏十分重视李卓吾对《琵琶记》的批评意见，多处引用李卓吾的评点批语。从这个本子的全部改动考察，徐奋鹏的改动意图有这样几方面：

在主题上，他更为集中和突出了原作对伦理道德的强调，特别突出了“孝”的道德内涵。这一意图特别体现在“风木余恨”一出张广才责备蔡伯喈和“立碑”情节的增加上。徐奋鹏在该出出末有批语说：“馆人读旧《琵琶记》，至庐墓受封等事，掩卷而叹曰：此何异今人家？生不能左右承欢，而亲没之后饭僧修焚以示荣观乎？”他借张广才之口责备蔡伯喈道：“大丈夫行事须要自断，就是朝廷有命，合宜孝亲为重；何况事由相府，就有所违逆，不过坏我官爵，终不成杀我性命？”他对蔡伯喈在总体上是采取谴责态度的，“立碑”时，张广才先写的碑文是“不忠不孝蔡伯喈”，后经蔡伯喈请求才改为“全忠全孝蔡伯喈”，对此，他在出末批语里也作了解释：“至于改书忠孝字样，以完收全部传奇之旨，又以见士人立身行事，即山林野老，自有不泯之公论在天壤间也，可不慎哉！”换言之，他是借蔡伯喈事警醒世人，为人不可不忠不孝。

徐奋鹏对原作中的人物形象也作了不少的改动，这在改本第一出“伯喈总题”的下场诗中就有交代。原作的下场诗为：“极富

极贵牛丞相，施仁施义张广才；有贞有烈赵贞女，全忠全孝蔡伯喈”；改本的诗为：“牛太师强招门婿，张广才义恤邻家；蔡学士名昭史籍，赵贞女孝拨琵琶”。对于这一改动，徐奋鹏在出末批语中也作了解释：“从来诸本，俱云‘极富极贵牛丞相’，传中与富贵何干？又云‘施仁施义张广才’，仁义二字不免叠用矣！又云‘有贞有烈赵贞女’，此传迺论孝敬，非论贞烈也；又云‘全忠全孝蔡伯喈’，恐蔡邕当此二句不起。”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，他对人物性格作了一定程度的加工，于牛丞相，集中一个“强”字，突出其专横的性格；于张广才，突出其“义”的性格，特别在增加了“义责蔡伯喈”一段戏，使这个人物比原作中的形象更有光彩。对此，徐奋鹏的意图很清楚，“传中既设立张广才之名，亦不正特有赈贫之义也”，他要在“赈贫之义”之外，赋予其维护道德的“大义”性格内涵。于赵五娘，徐奋鹏强调的是其“孝”的性格特征，在若干局部增加了细节和道白，以表现其“孝”的精神；而于蔡伯喈，徐奋鹏对他有谴责，也有回护，谴责是抽象的，多在批语中出之，回护则是具体的，其表现是时时处处都让蔡伯喈处在忧思之中。

再有，徐奋鹏对作品的结构加以删削、合并，为的是使该剧更为紧凑，更便于在舞台上演出。在总体结构上，徐奋鹏将四十二出压缩为三十出，这已经使作品的结构大为紧缩，他所删除的五出戏应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，至少可以用暗场交代就可以处理的；他对几出戏的合并也是十分合理的，如将“金闺愁配”、“再报佳期”、“强就鸾凤”三出合并为一出戏，就省去了大量的多余笔墨，使情节更加集中紧凑。此外，徐奋鹏的改动还较多地考虑到了舞台演出的效果问题，原作“上表陈情”一出，有〔北混江龙〕曲子一支，徐奋鹏将其删去，并眉批道：“此处原有〔混江龙〕一支，其词亦可，但既颂白之长，又首以唱词之多，观者苦烦，况此特以引起伯喈奏事耳，何事多赘此闲语？东嘉亦于此

演筆力而已，故今削其曲而錄其白。”无论从“观者”的角度，还是从结构的角度考虑，删除掉这支曲子都是极为合理的。“思亲觅寄”一出，蔡伯喈让李旺安排拐子去宾馆歇息，读书信，写书信，对这一舞台安排，徐奮鵬特地加眉批道：“辞拐儿出宾馆，背地里诵书，背地里回书，最为有理。从来演者俱当面做，大非。”这就是从舞台演出的角度作出的改动。

### 三、批语的价值

像《西厢记定本》一样，徐奮鵬在改动《琵琶记》的同时，也作了大量的眉批和出末批，并且辅之以圈点。因此，该本既是一个改本，也是一个评点本。其数量繁多的批语表达了徐奮鵬的戏曲创作观点，值得我们重视。

首先，徐奮鵬非常重视戏曲艺术的真实性，在改动的多处，都加了批语，指出自己的改动是基于真实性的考虑，例如“高堂祝寿”一出中赵五娘的出场处理，原本是蔡伯喈在说白之后让她请蔡公、蔡婆出来，舞台提示为“旦内应科”，却在蔡公蔡婆登场唱了几句曲词后才出场。徐奮鵬改为赵五娘先出场，念了几句道白后，蔡公、蔡婆出场。眉批道：“诸本俱作赵五娘待下随蔡公蔡婆始出，殊非理。今改先出，与伯喈同在台上，以候公婆才是。”按说，这是个很小的问题，可是徐奮鵬却非常重视，因为按照封建社会生活之“理”来看，作为媳妇的赵五娘不应该在公婆之后再出场，而应该先在场上，等候公婆的到来，而且这也符合赵五娘孝敬公婆的性格，才具有真实性。又如，“望月思家”一出〔念奴娇序〕曲中，有“惟愿取，年年此夜，人月双清”几句唱词，可能徐奮鵬依据的本子是蔡伯喈与牛氏合唱的，徐奮鵬则改为“众唱”，并眉批说：“伯喈自成名成姻之后，所唱词俱是乐中之忧思也，故予所改本于此中极意斟酌。‘惟愿取，年年此夜，人月双清’，李卓吾几欲删此二语，不与伯喈唱，然删之则不成〔念奴娇

序]矣！予因改为众唱，则庶几无碍焉。”显然，徐奋鹏注意到蔡伯喈的思亲心理，如果也让他和牛氏一样，沉浸在锦衣玉石的快乐之中，就不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情绪，就说无真实性可言；他把“合唱”改为“众唱”，让牛氏及其下人们作为感受“年年此夜，人月双清”的主体，就使蔡伯喈与他们拉开了距离，使他的思亲的忧思得到保留，从而保持了人物性格的真实性。

其次，徐奋鹏对《琵琶记》的悲剧风格有着深入的体认。他在《沿途苦栖》一出中采用的一大段〔琵琶词〕，无疑增强了作品的悲剧感染力；他在“孝感天恩”一出的出末批语中还解释了自己之所以保留这一出戏的考虑：“详玩《琵琶记》全部，至庐墓与张公相会即可以了当。然以通部皆系悲词，而末以欢会煞之，亦从俗见也。”换言之他个人的看法是，《琵琶记》是一部地道的悲剧，“通部皆系悲词”，从悲剧艺术的审美观点看，到“风木余恨”一出蔡伯喈与张广才相见就可以结束，可是一般观众的审美观念则总是要求有“大团圆”的结局，因此他的改定也不能不考虑这个现实要求，只好“从俗见”。无论如何，徐奋鹏对《琵琶记》的悲剧风格是有着清醒认识的，他对最后一出戏没有必要保留的看法也是富有见地的。

再次，徐奋鹏在批语中提出了不少的戏剧创作作法论。在一出“伯喈总题”的出末批语中他指出：“凡传奇，首折提总语，须句句担力，字字筋节，即如春秋书法一般。”这是对传奇创作的第一出提出的合理要求；“强婚成配”一出，系合并“金闺愁配”、“再报佳期”、“强就鸾凤”三出戏成一出戏，在该出眉批中，他总结了一个“铸散金以成片”的手法：“此出移缀前二段来，一见女之不敢强，一见生之不欲赴。正是铸散金以成片。”这一手法对于戏曲创作来说是有积极启发性的。此外，徐奋鹏还注意到戏曲作品的“关键”、“关节”以及前后照应问题。在第一出他就指出“父不从其就养之意，君不从其辞官之意，相不从其却婚之意，

‘三不从’是此记大关键”；在“风木余恨”一出有眉批道：“遗头发、嘱拄杖及〔琵琶曲〕，乃此传奇部中大关节处”，他让张广才责备蔡伯喈，说出赵五娘遗头发、蔡公嘱拄杖等事情，“皆与通部有关会”。而在“祝发葬亲”出，他特地添加了张广才对赵五娘交代蔡公嘱拄杖的一段道白，也加了眉批说：“补出拄杖句，以吊末局之责脉。本局是卖发，而尾白又要到头发上来说，最有意味。”徐奋鹏所提出的“关键”、“关会”以及“责脉”等问题，都是戏曲创作难以回避的重要手法，它们对于如何安排好戏曲的情节结构都是富有启发价值的。

徐奋鹏的朋友苍琅子在“风木余恨”出后也写了一段批语，说到自己问徐奋鹏为何对改定一本传奇如此“精细”？他引用了徐奋鹏的原话：“戏言出于思。不作传奇则已，如作传奇观，安得不用精细工夫？予于《西厢》既增改定本，无口口当。《琵琶记》原与《西厢》并行，字内不朽者。正宜求其精细，故自此之后，各折或增或减，或改或订，曲或全易或略更，皆必求其理之妥、情之顺而后已。”从《伯喈定本》的改定看，徐奋鹏确实下了不小的乃至“精细”的工夫，他对原作主题的集中和突出，对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的加工，对全剧结构的紧缩，以及在批语中所表达的创作思想，都是值得我们肯定的；与《西厢记定本》相比，它甚至没有增加一点庸俗无聊的成分。也因此，这个改本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加以研究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